

大足宝顶大佛湾第 15 号龕“临产受苦恩”男像再考^{*}

刘 辉 陈培丽

(大足石刻研究院, 重庆市 402360)

关键词: 宋代; 宝顶山大佛湾 15 号龕; 《报父母恩重经变相》; 生育; 医者

摘 要: 宝顶山大佛湾第 15 号龕《报父母恩重经变相》中有“临产受苦恩”图像, 图中有一男像。本文通过对文献和图像的考察, 认为该男像应为手拿医书的医者, 正在指导乳医和产妇分娩。大佛湾第 15 号龕“临产受苦恩”图像直观表现了宋代民间生育分娩的景象, 为研究当时的医疗情况及生育观念提供了实物证据。

Keywords: the Song Dynasty; Cave 15 of Dafowan, Baodingshan; *Sūtra Illustration of Repaying Parents' Kindness*; childbirth; physician

Abstract: The tableau of “The Kindness of Enduring the Suffering of Childbirth” is part of the *Sūtra Illustration of Repaying Parents' Kindness* in Cave 15 of Dafowan, Baodingshan, there is a male figure in this tableau.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extual sources and images in the tableau, and identifies the male figure as a physician holding a medical manual and instructing a ru-yi (midwife) and a lying-in woman during childbirth. “The Kindness of Enduring the Suffering of Childbirth” in Cave 15 of Dafowan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scene of childbirth and delivery among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provides tangible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into medical practices and views on childbirth at that time.

大足宝顶山石刻完成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 由大足本地僧人赵智凤主持凿刻, 造像工艺精湛, 其中佛教造像的世俗化及其与儒家孝义观念的融合更是独树一帜。宝顶山《报父母恩重经变相》现存两龕, 一为小佛湾第3号龕, 规模较小, 没有铭文, 且保存较差; 一为大佛湾第15号龕, 规模宏大, 图文并茂, 整体保存较为完整。第15号龕中层“十恩图”的第三幅“临产受苦恩”生动再现了宋代女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场景, 是宋代妇产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图像资料。宋代妇产科学在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诊疗方法等方面已日臻完备, 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学科^[1], 第15号龕“临产受苦恩”图正与当时临床医学的发展相印证。本文结合

相关文献和图像资料, 考察“临产受苦恩”图像中的男性身份, 并进一步研究当时的生育医疗文化。

一、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文本来源及其内容

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被命名为“父母恩重经变相龕”, 主要依据《报父母恩重经》的文本内容凿刻。《报父母恩重经》是唐代中国僧人编写的伪经, 成书时间应在武周之前, 该经是佛教为消弭与中国文化间的抵触, 扫除弘法障碍而积极提倡孝道的产物。此经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补充完善, 根据其行文、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种版本, 约至五代时期形成了最终版本, 即丁本, 其将父母

^{*} 本文为2025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川东唐宋石窟涉医资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 2025PY14)的阶段性成果。

恩德归纳为具体的“十恩德”，以正面劝导百姓行孝，同时又以“不孝之人入坠阿鼻地狱”的负面惩戒来督促行孝。这一版本《报父母恩重经》的流传既有传统的经文，又有经变相、经变画、讲经文和《十恩德》歌赞传唱等形式^[2]。大足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和小佛湾第3号龕两处《报父母恩重经变相》均以此为文本来来源凿刻。

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立面呈横长方形，龕内最高6.76米，最宽13.44米，至后壁最深2.08米。龕内造像分上、中、下三层布置，最上层为七佛半身像，诸佛名未有标明，但据《法苑珠林》大概可知。《法苑珠林》记载：“《七佛父母姓字经》云：第一维卫佛，第二式佛，第三随叶佛，此三佛同姓拘楼（《长阿含经》云：第一名毗婆尸佛，第二尸弃佛，第三毗舍婆佛。）第四拘楼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叶佛。此三佛同姓迦叶（《长阿含经》云：第四名拘楼孙佛，第五拘那含佛，第六同名迦叶佛。）第七今我释迦牟尼佛，姓瞿昙。”^[3]中间层刻“父母恩德”图像11组，居中为序品“投佛祈求嗣息”图，左右由内到外、依次交错刻父母“十恩德”图，空隙壁面饰以云纹。下层为“不孝之人入阿鼻地狱”图，包括受刑者和狱卒，还有蛇、犬等动物。另有交错刊刻的碑刻铭文^[4]。

中层“十恩德”图第三幅为“临产受苦恩”，位于序品“投佛祈求嗣息”图右侧。（图一）图中左上角为一产妇，紧咬牙齿，嘴唇微张，似在忍受分娩阵痛，右手轻抚隆起的腹部，左手收于袖中贴身下垂。其身身后有一女性，神色紧张，左

手扶产妇腋下，右手未明确刻画。产妇前方单膝跪一妇人，左手正在挽右手衣袖，应是准备接生的乳医。图右站一男子，位于产妇对面，左手抬起微弯，右手抬于胸前，持一书状物，神色平静。男像和产妇之间刻有一碑，铭文如下：

第二/临产受苦恩/慈觉颂曰/□□慈亲苦/□人眼泪□/□知恩力重/（能）取出胎时/慈父闻将产/空惶不自持/□生都未（报）/头耳皱双眉/^[5]

二、“临产受苦恩”男像身份的再考察

目前国内对于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报父母恩重经变相》已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多关注此龕造像的文本来源，对于“临产受苦恩”中男像的身份则只是顺带提及。《大足石刻内容总录》提到：“产婆后站立产妇丈夫，手拿经书，面带盼望焦虑之色。”^[6]但《大足石刻铭文录》认为该男子为男巫师，手持令牌驱邪^[7]。此后相关研究多不认可《大足石刻铭文录》的观点，一般都认为该男性应该是产妇的丈夫，如胡良学^[8]、马世长^[9]和李贞德^[10]等，但均未提出可信例证。程郁根据铭文认为这位男性是



图一 宝顶山大佛湾第15号龕中层“临产受苦恩”造像

父亲，并推测其手中所持乃是催生经或催生符之类的物品^[11]。最新版的《大足石刻志》没有提到男像身份^[12]。另比较详细的研究是李小强一文^[13]，该文经过图像对比、铭文考证认为该男性是产妇的丈夫，但对于该男像出现在生产场景中的原因、手中所持何物等问题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论证。通过对相关图像和文献的考察，笔者以为该男像应该是一名医者，医者的出现，也正是为了深化“父母恩重”的主题。

（一）文献考察

从文献角度考察，大佛湾第15号龕主要依《报父母恩重经》雕刻，“十恩德”赞文则是四川僧人慈觉大师宗赜的作品。现存各版本的《报父母恩重经》及同类经文关于妊娠问题的论说除当时的一些社会常识，主要取材于《耆婆五藏论》中被《妇人大全良方》《医方类聚》等书引用的内容和汉本佛经《大宝积经》第十三、十四会，兼采其他佛经汇合而成；思想方式则沿用《耆婆五藏论》和中国传统医书《徐之才逐月养胎方》等以月为妊娠周期，十月生产的中国妊娠论，其内容受时地环境和取材范围（汉文文献）的影响^[14]。《报父母恩重经》在提到母亲妊娠生产的过程时，均强调母亲怀胎生产的痛苦和危险，而未提到父亲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马世长对国内外发现的抄本、刻本《报父母恩重经》进行精细对校，内容基本相同，其中如敦煌抄录本《报父母恩重经》提到：

阿娘怀子，十月之中，起坐不安，如擎重担。饮食不下，如长病人。月满生时，受诸苦痛。须臾好恶，恐惧无常。如煞猪羊，血流遍地。受如是苦，生得此身^[15]。

引文内容实际包含了大佛湾第15号龕造像中“怀胎守护恩”和“临产受苦恩”两

部分的内容，其中并未提及父亲的出场。值得注意的是经文中关于生产过程的描述，如“月满生时，受诸苦痛”，“如煞猪羊，血流遍地”等，可知经文中提到的并非一个顺利的生产过程。道教经典《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约成书于宋元时期，其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是故生产有诸厄难，或月水流行，洗浣污衣，或育男女，血污地神，污水倾注溪河池井，世人不知不觉汲水饮食，供献神明，冒触三光……或致子死腹中，母亡产后，或母子俱亡，至伤性命……死入丰都血湖地狱，备受诸苦，由积血以成湖，认幻缘而有狱^[16]。

李贞德认为，医书和这些宗教文本中的各种禁忌及血污场景的描述“确认了女性从社会角色而来的不洁形象”，妇女因产乳而不洁，不仅是产血的污秽，可能也是因为妇女角色的转换^[17]。但从医学的角度考虑，文本中“如煞猪羊，血流遍地”及“或月水流行，洗浣污衣，或育男女，血污地神”等对生产过程中出血的描述，似乎都暗示生产过程并不顺利。同时，这些描述也反映了古代在生育医疗技术不足情况下的普遍观念，即生产是一个充满了艰难和危险的过程。

《报父母恩重经》中还有相关赞文对父母“十恩德”进一步说明，大足以外各地流传的《报父母恩重经》“十恩德”赞文同样没有提到父亲的角色，按马世长校录各版赞文如下：

怀经十个月（《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作“怀胎向十月”），产难欲将临。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沉（《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作“日日自畅吟”）。惶怖难成计，愁泪满胸襟。含啼告亲族，惟恐死来侵^[18]。

赞文中再次强调了分娩对母亲身体的

影响,又提到“惶怖”“愁泪”“惟恐死来侵”等产妇心态,可见仍是在强调分娩过程的艰险。大足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临产受苦恩”铭文引赞文提到:“慈父闻将产/空惶不自持”,一些研究者主要据此认为男像身份为产妇的丈夫。但图像内容可能并非对铭文内容的直观表达。首先,“临产受苦恩”图中的乳医、侍女及“十恩德”图第一“怀胎守护恩”中出现的侍女和第七“洗涤不净恩”中抱着孩子的侍女均未在赞文中提到,可见不能将图文简单对应。其次,根据侯冲发现整理的慈觉和尚《孝行录》的部分佚文和麦积山文书《报恩道场仪》所反映的部分内容,可知慈觉有关十恩德相关思想言说同样来自《报父母恩重经》^[19]。故而碑铭所引慈觉颂文虽与第15号龕“十恩德”图有一定对应关系,但其只是对画面及佛经的进一步阐释,而不是雕刻内容的实际经典依据^[20]。换句话说,慈觉所著颂文与大佛湾第15号龕中层“十恩德”变相均是作者依据个人理解对《报父母恩重经》相关场景的阐释,前者并非后者的经典依据,后者也并非前者的图像阐释。且图中男像左手抬起微弯,右手持书状物,面容平静似在与人交流,实不像是一位惊慌失措的父亲。

综上可知,《报父母恩重经》或15号龕内铭文,并不足以证明该男像为产妇丈夫。在《报父母恩重经》和赞文中,作者均是希望借分娩过程中的“产难”来突出母恩难报,父亲的角色作用则被淡化,显示出在宋代母亲在生育子女过程中的责任主体地位^[21]。

(二) 图像考察

除大足宝顶山两处《报父母恩重经变相》为石刻造像外,其他唐宋时期作品主要以经变画的形式呈现。如现存敦煌石窟的四幅经变壁画和两幅经变绢画,以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报父母恩重经》卷首两幅版画对

“十恩德”有所涉及^[22]。(表一)甘肃省博物馆藏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中左侧自下而上第三幅内容是为新生儿沐浴,榜书:“十月将满,产后母子具显,洗浴时”^[23]。该图似包含产褥环节,但并未在图中明确表现,也无法看出分娩过程是否有男性参与。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刻印《报父母恩重经》也有附刻变相图,其中龙珠寺刻本《报父母恩重经》卷首插图“十恩德”图,其“临产受苦恩”图表现的似为生产后“洗儿”的场景^[24]。又山西右玉宝宁寺旧藏明代水陆画中有《堕胎产亡严寒大暑孤魂众》图,虽与《报父母恩重经变相》表现主题不同,但二者均再现了当时女子生产的场景,画面中有一男性医者坐于房外,与产房相隔,他虽不在产房内,但明显也参与了分娩过程^[25]。

三、中国传统分娩场景中的男性角色

大佛湾第15号龕“临产受苦恩”中男性左脚和左手向前,作与人交流状,应与产妇在同一场景中。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孕产向来是不洁且不吉之事^[26],孙思邈称“凡作膏,常以破除日,无令丧孝污秽产妇下贱人鸡犬禽兽见之”^[27]。李时珍认为“女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28]。《礼记》称:“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生子,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齐,则不入侧室之门。”^[29]虽然有研究显示,在一些传统催生方法中“丈夫被赋予特有的活力,介入妻子的分娩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身涉险境的妻子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起到安抚的作用”^[30],但所需要的也仅是丈夫的名字、贴身衣物、指甲和毛发等物,并不需要丈夫本人在场。唐元和年间(806~820年)

表一 唐宋“报父母恩重经变”一览表

地点	形式	年代	内容
莫高窟238窟	壁画	中唐	上部绘说法图，下部绘经文故事。
莫高窟156窟	壁画	晚唐	顶部绘连绵山峰，中部为佛说法图，下部为表现父母养育之恩的经文情节。
莫高窟170窟	壁画	北宋	上层东西两侧各绘一端立男子，第二层为佛说法图，说法图两旁绘表现父母养育之恩的经文情节。
莫高窟449窟	壁画	北宋	上部原绘经文前序故事，中部绘佛说法图，下部绘经文故事。
藏经洞（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绢画	五代或北宋	上段绘变相图，下段为发愿文，绘有施画主像。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主要为佛说法及听法眷属，下部为父母对子女恩重如山的各种情节。
藏经洞（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绢画	北宋	最上层为趺坐七佛，左侧有题名榜书；第二层为弥勒降生与转轮王治世；第三层中间为佛说法图，两侧为十五幅表现父母养育之恩的经文情节。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15号龕	造像	南宋	上层为七佛半身像，中层为“十恩德”图及序品“投佛祈求嗣息图”，下层为不孝之人入地狱景象。
大足宝顶山小佛湾3号龕	造像	南宋	位于龕左右壁外侧，上部对称刻半身佛像三身，与正壁主尊佛像构成七佛，中下层刻序品“投佛祈求嗣息图”及“十恩德”图。“临产受苦恩”中除侍女、产妇和稳婆外，右上方有一着冠男性像，左手抬起，身份未知。
黑水城TK-119（现藏俄罗斯）	版画	西夏	中间最上层简绘山峰，下部为佛说法图；左面八幅连环画表现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具体方法；右面八幅连环画表现不孝子受刀山火海之苦。
黑水城TK-139（现藏俄罗斯）	版画	西夏	仅存一页，绘两个披衣合十僧人立像。

的一则故事亦体现时人视产妇为不洁的观念：

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李举进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临月，迁至后东阁中。其夕，女梦丈夫，衣冠甚伟，瞋目按剑叱之曰：“此屋岂是汝腥秽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祸。”明日告推，推素刚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数日，女诞育，忽见所梦者，即其床帐乱殴之。有顷，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伤痛女冤横，追悔不及^[31]。

齐推因不信鬼神之说未及时将女儿迁移他处，致女儿在产后为鬼祟所侵而横死，可见产育相关禁忌在时人心中的严肃性。在此种观念影响下，临产之时一般是请乳医接生，如《夷坚志》载绍兴三十年（1160年）“杨（抗）之子恂妇将就蓐，恂出外唤人呼乳医”，又有龚涛“其母方娠时在衢州，及期，将就蓐，遣呼乳医”等^[32]。《卫生家宝产科备要》称“临产之时，不可令傍人喧扰，大小仓忙，虑致惊动产母。只可令熟事产婆及稳审谨卓老成亲密三两人，扶侍产

母”^[33]。15号龕“临产受苦恩”中乳医位于居中显要位置，另有一侍女在产妇身后扶持，可见两人应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特殊情况下，如出现难产或产家比较重视，则会请来男性医家在一旁指导或随时准备救护。王焘《外台秘要方》中引录的一则医案详细记述了一次分娩过程，兹引录如下：

余因批阅峦公调气方中，见峦公北平阳道庆者，其一妹二女，并皆产死，有儿妇临月，情用忧虑，入山寻余，请觅滑胎方……以此意语庆，庆领受无所闻，然犹苦见邀向家，乃更与相随，停其家十余日。日晡时见报云：儿如腹痛，似是产候。余便教屏除床案，遍一房地布草三四处，悬绳系木作衡。度高下，令得蹲当腋，得凭当衡下敷慢毡，恐儿落草误伤之。如此布置讫，令产者入位，语之坐卧任意，为其说方法，各有分理，顺之则全，逆之则死，安心气，勿怖强。此产（者）亦解人语。语讫闭户，户外安床，余共庆坐，不令一人得入，时时隔户问之何似，答言小痛

可忍。至一更，令烂煮自死牝鸡，取汁作粳米粥，粥熟，急手搅，使浑浑，适寒温，劝令食三升许。至五更将末，便自产，闻儿啼声，始听人入^[34]。

阳道庆一妹二女皆因难产而死，故儿媳生产时提前请来名医守护以防意外。临产之时医者密公安排好产房后，和阳道庆坐在产房外，时时询问指导。当然，事先请来男性医家以防发生意外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在生产不顺利时临时延请医者^[35]。如《证治准绳：女科》引《夷坚志》中的一则故事：

杜壬治郝质子妇，产四日，瘕痕戴眼，弓背反张。壬以为瘕病，与大豆紫汤、独活汤而愈。政和间，余妻方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证，头足反接，相去几二尺，家人惊骇，以数婢强拗之不直，适记所云，而药草有独活，乃急为之，召医未至，连进三剂，遂能直，医至即愈矣。更不须用大豆紫汤^[36]。

杜壬“医术有名于京东，知郢州邵亢荐之，召赴阙，试于御药院，诸医称其能”^[37]。熙宁六年（1073年）他被任命为翰林医官，曾为人治疗难产疾病。后洪迈本人妻子产褥过程中突发疾病，症状与郝质子妻相同，延请医者的过程中洪迈尝试杜壬的治法，竟真的在医者赶来之前治好了。北宋名医庞安时的经历，更证实了医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尝诣舒之桐城，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无所效。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拊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时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复能脱，故非符药所能为。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既痛即缩

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如此^[38]。

桐城一民妇难产，其间请了很多医者都没有办法，李百全邀请其师庞安时一同看诊，庞安时以精妙按摩手法和针法治好。南宋妇科名医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中也多有相似案例，其中记载有一陈自明本人治例：

缪宅厥息孺人杜氏，生产数日不下，坐婆、魂童救疗皆无效，召仆诊之。仆曰：产前脉不可考，但当察色而知之，遂揭帐明烛以察之，其面色赤，舌色青，见此色者，知胎已死，母却无忧矣。或问曰：何以知之？余答曰：面赤舌青者，子死母活明矣。供自合至宝丹二粒服之，胎即落矣。以此见古人处方神速^[39]。

产妇家人面对难产情况最初想先请陈自明诊脉判断，很可能是隔着床帟，但陈自明认为产前脉象难考，故揭开床帟掌灯近距离观察产妇面色后开药治疗。故无论是庞安时的按摩手法和针灸，还是陈自明观察产妇面色并开出药方，都需要和产妇近距离接触。《夷坚志》中还有其他关于生产过程中延请医家的记载，如“县酒官吕生妻临蓐，五日弗产。或曰：‘非屠醉不可’。吕亟召之，至则醉矣。径入室，隔衣略扪抚即出曰：‘且扶坐，少顷免身矣。’俄闻婴啼声”^[40]。衣若兰也指出，既然产科在宋明时期独立发展，应有男性为妇人接生者，由男医者常为难产的妇人看产可证^[41]。可见在产妇分娩不顺时，医者会被请到现场诊治，非在产房外简单询问，而是进入产房内进行和产妇有所接触的诊疗。甚至男性医者可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宋代专事妇产科的医者不多，在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之前还没有系统且专门的妇产科专著，已有著作或失之过简，或缺乏体系，检阅不便^[42]。朱端章和郭稽中都曾提到“免

(娩)乳大故,方书浩博,自非素习,谁能适从?危殆之间,颇艰应用”^[43]。黎民寿也说“妇人疾病最危甚者,莫危于临产……若非博学强识之士,于仓卒间宁有定见乎?”^[44]直到清代仍有医者感叹:“胎产一事,自《产宝》诸书以后,代有发明,其保胎临产,及产后调理之法,率皆至精至密……倘非究心有素之人,未易明而用之也。仓卒之际,殊难得力。”^[45]故而当时普通医家即使是专门的妇产科医生,面对产褥大故时翻检医书可能也并不少见。

综上,受当时社会中产妇不洁和不吉观念的影响,男性一般不会出现在产房。如生产顺利,则产妇身边可能只有乳医和协助生产的女性。但若生产不顺利,出现难产等情况,产家则会请来医者为产妇诊治。而古代社会认可的女性医者极少,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这是当时的普遍认知。因此,结合《报父母恩重经》中对于生产场景的描述,可以认为“临产受苦恩”造像中的男像最有可能是一位在难产情况下协助生产的医者,其手中所持应为产科医书,面对产妇正在进行问询和指导。

四、结 语

宋人认为“生育既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有必要干预的医疗难题……在宋朝的医学中生育具有特殊意义,如同宇宙征象,如同身体的危机需要症状来管理,如同生命转移的宗教仪式”^[46]。大足宝顶《报父母恩重经变相》中“临产受苦恩”图可谓对宋代女性妊娠分娩过程的生动再现,上引《报父母恩重经》和相关图文对分娩场景的描述均未出现父亲这一角色。从史料记载可知整个生育过程除产妇外,也只有抱腰之人、乳医和男性医者三者可能出现在分娩场景中。又根据《报父母恩重经》相关内容描述可判断图像中的母亲在分娩过程中出现了难产,

所以图中男像应是请来指导生产的医者。同时,医者的出现也正说明生育子女的艰险,进一步突出父母恩重难报的主题。

李涪认为,佛教造像并非只为了造像,而是当面对社会、面对生活之时,探索生命本身的意义,使人能有“走向文明的自觉”^[47]。

“孝”是大足宝顶石刻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中又以《报父母恩重经变相》表现最为直接。母恩何以难报?除常年的养育不易,更重要的是在临产之时母亲可能有生命之虞,宋人称“妇人疾病最危甚者,莫危于临产,其性命在呼吸间,古以陈面健儿为喻,可谓危矣”^[48]。大佛湾第15号龕“临产受苦恩”造像也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母亲恩情之重。

-
- [1] 孔淑真. 宋代妇产科学. 中华医史杂志, 1994, (3).
 - [2] a. 郑阿财. 《父母恩重经》传布的历史考察: 以敦煌本为中心 // 项楚, 郑阿财, 主编. 新世纪敦煌学论集.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27~48.
b. 孙修身. 《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版本研究 // 敦煌研究院, 编. 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1996: 239~249.
 - [3] 释道世, 撰. 周叔迦, 苏晋仁, 校注. 法苑珠林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270.
 - [4] 大足石刻研究院, 编. 大足石刻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2: 174.
 - [5]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大足石刻铭文录.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98.
 - [6] 刘长久, 胡文和, 李永翘. 大足石刻内容总录 // 大足石刻研究.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476.
 - [7] 同[5].
 - [8] 胡良学. 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龕刻石之管见. 敦煌研究, 1998, (4).
 - [9] 马世长. 《报父母恩重经》与相关变相图 // 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521~586.
 - [10] 李贞德.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 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台北: 三民书局, 2008: 121.

- [11] 程郁. 从大足石刻观察宋代一些特殊的劳动妇女. 中华文史论丛, 2020, (4).
- [12] 同[4].
- [13] 李小强. 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图”“临产受苦恩”男像身份考略 // 大足石刻佛教造像论稿.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20: 280~289.
- [14] 李勤璞. “父母恩重经”类伪托佛经的妊娠论 // 中医典籍与文化: 第一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73~90.
- [15] 同[9].
- [16] 佚名. 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 // 中华道藏: 第6册.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05.
- [17] 同[10]: 131~132.
- [18] 同[9]: 553.
- [19] a. 侯冲. 宗贇《孝行录》及其与大足宝顶劝孝石刻的关系 // 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270~293.
b. 魏文斌, 李晓红. 麦积山明代写本《报恩道场仪》及相关问题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 2005, (3).
- [20] 同[19] b.
- [21] 汪悦菱. 大足《父母恩重经变相》图像研究. 大众文艺, 2024, (4).
- [22] a. 同[2] a.
b. 孙修身. 大足宝顶与敦煌莫高窟佛说父母恩重经变相的比较研究. 敦煌研究, 1997, (1).
c. 同[9].
d. 崔红芬, 文志勇. 俄藏黑水城汉文《报父母恩重经》卷首画解析. 青海民族研究, 2021, (2).
- [23] 李永平. 北宋《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 文物天地, 2015, (4).
- [24] 同[9]: 565, 566.
- [25] 杨金萍, 王振国, 胡春雨, 等. 佛教水陆壁画中的涉医图考. 医学与哲学, 2017, (7A).
- [26] 同[10]: 127~132.
- [27] 李景荣, 等. 校释.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178.
- [28] 李时珍. 本草纲目. 陈贵廷, 等.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4: 1197.
- [29] 郑玄, 注. 孔颖达, 疏. 礼记正义 // 十三经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860.
- [30] 方燕. 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 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27~129.
- [31] 李昉. 太平广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835.
- [32] 洪迈. 夷坚志. 何卓,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94, 338.
- [33] 朱端章.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4.
- [34] 王焘. 外台秘要方. 王淑民, 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602, 603.
- [35] 杨金萍, 胡春雨. 从永乐宫、宝宁寺壁画谈古代妇女产蓐过程及诊病禁限.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2).
- [36] 王肯堂. 证治准绳: 女科 // 王肯堂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2231.
- [37] 徐松. 宋会要辑稿. 刘琳, 刁忠民, 舒大刚, 等.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942.
- [38] 脱脱, 等. 宋史: 卷四百六十二: 方技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3521, 13522.
- [39] 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356.
- [40] 同[32]: 1715.
- [41] 衣若兰. 三姑六婆: 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 台北: 稻乡出版社, 2006: 68.
- [42] 蔡景峰. 中国医学妇产科学奠基者陈自明.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7, (2).
- [43] a. 同[33]: 34.
b. 郭稽中, 李师圣, 等. 产育宝庆集方 // 曹炳章, 编. 中国医学大成绩集: 35. 影印本.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43.
- [44] 黎民寿. 黎居士简易方论 // 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 续: 第二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69.
- [45] 周仲瑛, 于文明, 主编. 增广大生要旨、达生编.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383.
- [46] 费侠莉. 繁盛之阴: 中国医学史中的性: 960—1665. 甄橙,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90.
- [47] 李焘. 四川宋代菩萨造像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04.
- [48] 同[44].

(责任编辑: 宋 佳)